

边际革命：中外合作办学

丁笑炯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教授

电子邮箱:dingxiaojiong@hotmail.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它主要以两种形式展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至少提供三个办学项目。教育部网站显示,2016年3月,在全国34个省中的28个省,共有73所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和1100个办学项目提供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国政府只允许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611所海外高等教育机构与414所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提供了1173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中外合作办学一直与能力建设的概念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经历了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证明是过时和失灵的。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出现,并有望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中国政府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重视超过对项目的重视。虽然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由本地师资(即“学校”)设立和管理的,但这些合作机构与本地教师并肩运作,因此需要从他们的海外合作伙伴那里引进管理实践和教学资源。2013年,教育部开始对23个省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评估。其中一个评价指标是“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国内教师在教学、研究和学术实力方面的内部效益”。

中外合作办学师资的“学术弱点”

与政府的期望相反,中外合作办学未能成为组织和部门变革的孵化器。在《迷失在

国际化空间:维持学者海外教学的挑战》(*Lost in Internationalised Space: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ing Academics Teaching Offshore*)”一文中,德波夫斯基(Shelda Debowski)讲述了一个故事,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商学院的教师参与合作办学项目,被认为投入较少科研精力,因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在海外教学,以至于发表的论文少于其他商学院的同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参加合作办学的中国教师身上。

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主要侧重于教学,而本地的主办学校和教师则把研究放在首位。合作办学项目教师招聘的一个标准是他们的教学意愿和能力,而在招聘过程中,申请者却要用他们的科研情况来竞争主办学校/项目的职位。中外合作办学教师聘任中,对于申请者科研能力的评价标准相较于本地学校/项目要宽松,被合作办学机构/项目聘用的教师可能会因为其所为的“学术弱点”而被本地主办学校拒绝。

外语教学给本地教师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许多教师有国际交流经验和/或在国外大学获得学位;然而,准备教学内容、设计考试和评估学生的外语作业仍然花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花在研究上。教师们经常抱怨说,对他们来说,完成学术成果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的教学任务本来就繁重。因此,跨国教育教师被认为在学术上是弱势的,并且次于本地主办学院/课程的同事。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术弱点”

尽管一些合作办学机构/项目是与顶级大学合作提供的，但中外合作办学本身被认为学术上仍然很薄弱。许多合作办学机构主要负责日常行政工作，严重依赖本地学院的兼职教师提供教学。因此，他们面临着被“掏空”的风险，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不是“内生的”，而是从本地教师那里“借来的”。由于缺乏独立的学术实力，合作办学机构的命名通常不是根据它们的学术专长（如“工程学院”），而是根据它们所依托的国际合作（如中英学校或中欧学校等）。有时，如果合作办学的几所海外合作大学来自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文社科项目与理工科项目都会附属于同一个合作办学机构（例如，一所合作办学机构包含了与几所法国大学在经济、广告和计算机学科的合作项目）。

然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近年来已变得很受欢迎。与分散在不同学院的合作办学项目相比，合作办学机构能够利用规模效应来吸引注意力。这使得它们对国际学生很有吸引力，也让相关的院校能够成为“改革者”。

合作办学项目与机构类似。这些项目隶属于本地学院，规模相对较小，但与本地学院紧密合作，提供教育和服务。因此，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面临着与办学机构一样的“空心化”风险。

其他教学实践的影响有限

大多数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都从本地项目中聘请了相当数量的兼职教师，希望他们将良好的跨国教学实践应用到本地教学中。然而，这远非现实。事实上，教师们只是“敷衍了事”地进行跨国教学，对其他教学实践

毫无兴趣。

此外，一些合作办学机构/项目主要是为了响应市场需求，并作为学生出国留学的跳板，即在海外合作院校进行第三和/或第四年的学习。来自中国和海外合作院校的教师教授同一课程，只是将学生分组：本地中国老师教授大一、大二的学生，这些学生大都在中国的学校中学习基础课程；海外合作学校的老师则教授大三、大四的学生，这部分学生一半都会去海外进行进一步深造。虽然本地教师有很多机会参与跨国教育，但他们很少接触外国的实践。

一场边际革命

中外合作办学在中国的地位和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可以称为“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由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和王宁提出的“边际革命”一词描述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急剧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在经济边缘触发的，也就是在现有体制框架约束之外运作的非公共部门得到了新生。这些边缘力量最终进入了经济主流，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经济体系。

与经济改革初期的非公共部门一样，中外合作办学也在正规高等教育体制框架之外运作。然而，它未能实现同样广泛和深刻的转变。由于合作办学及其师资的“学术弱点”，这些机构/项目经常在高校的定期绩效评估中垫底，而该评估非常重视研究。合作办学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被边缘化，无法为地方高校提供模式。由于种种原因，引进的外国专业知识很少能进入本地的学院。最终，经过30年的数量快速增长，跨国教育仍然处于高等教育体系的边缘，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